

2006

明代文学论集

M I N G D A I W E N X U E L U N J I

◆ 主 编 廖可斌
副主编 楼含松
周明初
徐永明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明代文学论集 / 廖可斌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308-05375-4

I. 2… II. 廖…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代—文集 IV. I 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235 号

明代文学论集(2006)

廖可斌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封面设计 刘依群

排版者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7.75

字数 831 千字

版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5375-4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目 录

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问题	左东岭(1)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陈书录(14)
刘基诗歌的表现手法和风格特征	
——刘基诗歌艺术研究之一	吕立汉(29)
《刘基集》的一篇集外文及相关考证	颜建华(39)
试论“吴中四杰”与张士诚政权之关系	晏选军(43)
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	陈广宏(54)
平淡诗坛上的翘楚者	
——15世纪诗人张楷生平事迹考略	〔日本〕李 庆(70)
词学反思与强势选择	
——马洪的历史命运与朱彝尊的尊体策略	张宏生(81)
倪谦出使朝鲜与《庚午皇华集》考述	詹杭伦 杜慧月(91)
题画诗与明代的绘画鉴定	
——重读沈周《石田稿》稿本札记	陈正宏(104)
李东阳诗学旨义探析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文学指向转换的一个侧面	郑利华(111)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邓新跃(127)
谢铎生平事迹考	林家骊(134)
山岳游观与文体竞合:乔宇的华山书写及其文体意蕴	
.....	〔中国台湾〕许东海(148)
李何分异及其意义	饶龙隼(161)
论“历下诗派”	周 潇 裴世俊(171)
明清时期吴中诗学论和外署诗学论的冲突与和谐	〔韩国〕元钟礼(183)
黄省曾的哲学思想及其在文学上的贡献	
——兼论王阳明哲学与文学的联系	谈蓓芳(206)
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	黄 霖(217)
茅唐之争: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分化与演变	刘尊举(229)
西湖八社考论	何宗美(239)
明代陆树声之画像自题析论	〔中国台湾〕毛文芳(250)

- 王士性山水诗审美意趣论 何方(266)
- 鸡足山读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许建平(274)
- 公安派与晚明政治的关系考论 黄仁生(285)
- 徐燧和荆山徐氏儒业与文学之兴衰 陈庆元(299)
- 丘兆麟《玉书庭全集》及其他 杨光辉(307)
- 论明末嘉定文人黄淳耀
——从黄淳耀与归有光之异同谈起 孙小力(317)
- 远山浅黛遣归梦
——祁彪佳诗歌创作初探 赵素文(329)
- 《寓山志》文本空间的对话网络 [中国台湾]曹淑娟(345)
- 论晚明山阴祁氏女性文学群体 陈水云 王 茁(359)
- 《幽兰草》与《倡和诗余》的版本价值 李越深(372)
- 布衣自有布衣语 不与簪绅朝士同
——略论方文的遗民情结与诗风 胡金望(379)
- 明末清初岭南诗僧群综论 李舜臣(391)
- 钱谦益与天启、崇祯年间社会思潮 丁功谊(405)
- 钱谦益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异同 王小舒(416)
- 从“朱应登小传”看钱谦益的明代文学批评 焦中栋(426)
- 承袭与新变:《倚声初集》对明清之际词学的批评 沙先一(437)
- 明代历史演义的内容构成 楼含松(446)
- 《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的两个问题 [日本]中川谕(456)
- 《西游记》的性别意识与性别母题 魏崇新(467)
- 《西游记》与民间秘密宗教宝卷 万晴川 陈苗枫(478)
- 《水浒传》中的三淫妇: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
——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形象漫议之一 萧相恺(490)
- 关于《金瓶梅》作者的问与答 [中国香港]梅 节(500)
- 《金瓶梅词话》中《西厢记》的文学影响 徐大军(509)
- 《杨家将演义》的形成与民间武装组织
——以招安、招亲为线索 [日本]松浦智子(519)
- 明传记体公案小说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文体演变 [日本]杨绪容(528)
- 初步分析《三言》《二拍》叙事语言
——试论“话本”和“拟话本”的形式特点 [日本]铃木阳一(541)
- 三一教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述论 夏广兴 王 伶(549)

《辽海丹忠录》的材料来源及创作特色	顾克勇(560)
《金云翘传》:叙事模式与人物塑造的双重突破	邱江宁(571)
一部可以和世界文学接轨的古典小说	
——《西游补》新论	赵红娟(578)
错乱中的坚守与复归:明清同性恋小说的性别意识	段江丽(589)
平淡而近自然	
——《红楼梦》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婚恋”模式的消解	
.....	蔚 然(600)
论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对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影响	聂付生(606)
明前中期乐制改革与演剧的变迁	李舜华(617)
明徐霖《柳仙记》佚曲辑考	黄仕忠(628)
明嘉、隆时期新思想与李开先	魏 青(638)
汪道昆二题	汪超宏(648)
“道学”与汤显祖的文体选择	程 芸(658)
袁于令与柳浪馆评点“临川四梦”	郑志良(667)
谈冯梦龙对《西楼记》的改编	霍建瑜(676)
遗民品格与王夫之《龙舟会》杂剧	杜桂萍(691)
明代南曲剧套尾声初探	吴 敢(701)
明杂剧研究文献三题	
——《盛明杂剧》、《远山堂剧品》、《群音类选》的正反面意义	
.....	徐子方(714)
论明清家乐的导演体制及其对明清戏曲导演理论的贡献	刘水云(724)
对明代文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	吴志达(736)
徐朔方先生与《明代文学史》	孙秋克(746)
编后记	(753)

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左东岭

论及元明之际的历史与文学,就不能回避种族意识与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牵涉到文人对待元明两朝的态度及其深度心理的问题,而这些又往往影响到文学创作特征与文学观念的内涵。

元明之际的文人到底存不存在种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历来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现代学术史上,史学界与文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均认为明王朝取元而代之带有民族复兴的色彩,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在元代遭受歧视的汉族文人群体尤其是江南文人群体的拥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历史事实,元末红巾武装曾以恢复赵宋王朝相号召,朱元璋也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可知当时此乃争取人心的有效手段,则人心之向背已昭然若揭。但是情况又并非如此简单,比如同出于金华学派,宋濂应召而辅佐朱元璋,而戴良却誓死效忠元蒙政权而不肯臣服于明。由此便有学者指出:“盖元之儒者,居于异族统治七八十年淫威之下,心志不免日丧,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在野在朝,虽亦学业文章有以自守,行己立身有以自完,然而民生利病,教化兴衰,或未能以斯道自负。夷夏之防,有所不知。”^①并对元明之际著名文人宋濂、刘基、高启、苏伯衡、贝琼、戴良诸人广为考察,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遭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②当代史学界有人对元末明初江南士人境遇做出具体考察后说:“总之,元末的江南士人,不论伊始依附张吴政权的,或参加朱明政权的,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的,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怀念元朝,而与朱明政权格格不入。”^③似乎元代的江南文人对元朝廷充满情感,民族隔阂与矛盾已不复存在似的。

如果认真对比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的易代状况,就会发现两者具有较大的差别。明末士人起兵抗清者不在少数,殉节死国难者亦比比皆是,而降

①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③ 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见《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清出仕新朝者不仅数量甚少,而且还要遭受舆论的责难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看一看钱谦益与吴伟业对自己失节行为的反复辩解与悔过,就知道当时的士人整体的逸民情结有多么深固。元末明初则不然,尽管从清人赵翼起就曾得出“元末殉难者多进士”的结论,^①似乎士人是很忠于元蒙朝廷的,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发现赵翼所举的16位殉国进士中,南人进士只有4人,而“元朝南人进士出仕明朝者,现已考知19人”^②,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刘基、张以宁、钱宰等。另一项研究的数字统计则是,元代进士仕明的共37人,只有2人属于被迫;在这自愿仕明的35人中,南方进士23人,北方12人。^③这些仕明的前元进士,虽然谈不上欢天喜地而依然心存种种忧虑,但却并没有表现出对元蒙政权的特殊情感;即使表现出有失节遗憾的,也与明末清初的民族气节区别较大。此容当后述。总之,元末明初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文人心态也相当复杂,有些历史因素与深层心理往往被表面现象所遮蔽。而要揭示当时的真实状态,有两个因素尤应引起关注,这便是旁观者心态与独特的气节内涵。下面便分而述之。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元代士人对元蒙朝廷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怨恨与对抗,并认为这主要得力于元蒙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对文人的宽容甚至优待。这种观点当然是言之有据的,因为凡是阅读过一些元代文人别集的,的确很难找到对元蒙朝廷的对抗与揭露,即使有一些不满与怨气,也大都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不是针对朝廷。但是如果细加寻绎,元代士人与朝廷之间的关系还是与其他朝代有明显的区别。元代士人由于科举制度被长期取缔而大多失去仕进的机会,这已经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这意味着汉族士人尤其是南方士人作为整体已经被边缘化,换句话说,元蒙政权的性质不是文官化的而是贵族化、军事化的。而在贵族化、军事化的背后,当然就隐含着民族的歧视与隔阂。这种民族的隔阂大多不会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变换方式的曲折表达。比如孔齐《至正直记》中有一则曰:“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之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消。”^④此处说讥讽对象为“色目北人”而回避了元蒙字样,但“江南”一词在文人士人中是有特殊意义的,

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05页。

② 萧庆伟:《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见《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12页。

③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99页。

④ 孔齐:《至正直记》,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91年版,第78页。

它常常与朝廷相对而成为士人的精神家园与人生归宿处,因而此处所讥讽的对象当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指色目人而无涉于蒙古人。清人陈衍对此颇有会心,他将此诗特意收入《元诗纪事》中,并评曰:“此诗大有寄托。”^①该诗现存于揭傒斯的别集中,是其《题芦雁四首》中的第四首,其文字略有出入,即三、四两句为“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可知该诗来源不止一个,当时可能广为流传。如果将作者揭傒斯、同时代人孔齐及后人陈衍的理解联系起来考虑,则活动于元代政治较为稳定开明的延祐年间的台阁文人依然未能与朝廷融为一体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该组“题芦雁”诗的第一首曰:“江湖处处非,况汝一身微。如何却欲下,只合更高飞。”^②这显然是因隔阂而造成的孤独感与疏离感,其中也应该“大有寄托”。因此,元代士人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与其说是行为上的冲突,倒毋宁说是心理上的隔阂。这种隔阂在形式上并不那么激烈,但是却根植于心灵深处而到处弥漫。比如说另一位台阁体作家虞集,也常常拥有此种疏离感,尽管他常年在朝中为官,但睡里梦里还是想的“杏花春雨江南”^③。后来,在宋濂主持撰修的《元史》里,对造成此种心理隔阂的原因有过很充分的表述。虞集在修辽金宋三史时,需要参考朝廷历代实录以考订史实,“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得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④。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外人”声里,很难不让虞集萌生异己感与疏离感。所以有学者说:“蒙元征服对士人影响最大方面则是后者传统仕进途径之丧失及其与国家关系之疏离。”^⑤

元代士人由失去仕进机会而被政治边缘化,由异己感而造成与朝廷关系的疏离,而边缘化与疏离感又直接导致了他们典型的旁观者心态。旁观者心态的表现之一是政治参与热情与政治责任感的淡漠。这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元代士人隐逸群体的庞大,在元代士人心目中,隐居是正常的而出仕是偶然的,做官就像出门做客与经商一样,终归还是要回到家中的。即使有机会进入官场,也会像替别人当差一样,因为他知道那个由蒙元贵族为核心的朝廷不属于自己。

① 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② 《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页。

③ 四库本《道园学古录》卷四,《风入松》。

④ 《元史》,《虞集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74—4475页。

⑤ 萧庆伟:《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见《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

旁观者心态的表现之二是视政治与道德为二途。自中唐以来,儒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建立起理学的新体系。尽管理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与理论,但都希望通过道德人心的拯救而带来政治的清明与天下的稳定。在理学体系中,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一以贯之的完整过程。当然,两宋时期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理学也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理学家更多的功夫还是下在修身的自我道德完善上,因而具有一种内敛的品格,但治国平天下却始终是终极的旨归。而真正完成此种内敛的品格则是在元代。一般认为程朱理学在元代开始官方化,但在学理性的提倡与实际政治运作之间毋宁说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或者说正好相反。元蒙朝廷视儒学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所以在元代士人心中,道德的修持并不一定是为了政治的参与,守道也不一定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可以是家族利益的维系,可以是斯文传统的传承,也可以是人格操守的完善。比如元初人杜瑛本有用世之思,忽必烈南渡灭宋时,他还曾为之出谋划策,但后来元朝廷征之出仕,他却并不应允,其理由很简单,即朝廷不能以道治理国家,在写给执政者的信中他如是说:“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兴化,以拯数千百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在他眼中,执政者只知追求“簿书期会,文法末节”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无意于道之讲求推行,将会弊端无穷,所以他对劝其入仕者说:“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末先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世?”^①于是便终生不仕,杜门读书,优游道艺。杜瑛本是金之文人,对宋朝亦决无黍离之悲。他所坚持的乃是先王之道,元朝廷不能以道治国,所以他便隐居不仕。这其中也许隐含着某些民族成分,但更重要的还是对道的追求与坚持。可以说元代很多隐逸不出的文人都是守道者。《元史》“隐逸”传里记载的几个隐士,几乎全是此种情形,用隐士吴定翁的话说,便叫做“士无求用于世,惟求无愧于世”^②。将用世与无愧对立起来,是元代士人的突出特点。

旁观者心态之三是闲散的生活态度与自我个性的放任。如果说儒者道德气节的修持往往在于家学与书院之中,则文人的闲适放任则大多发生于诗社的饮酒赋诗活动中。元代诗社特别发达,结社吟诗成为文人的常见生

① 《元史》卷一九九“隐逸”,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74—4475页。

② 《元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79页。

活方式。戴表元《胡天放诗序》说：“当是时，诸公之文章方期于用世，无有肯剗心凋形沉埋穷伏而为诗者。山川虽佳，其烟云鱼鸟，朝夕真趣，不过散弃为渔人樵客之娱而已。兵戈以来，游宦事息，乃始稍稍与之相接。而前时诸公吁谟典策之具，亦且倚阁无用，呻吟憔悴，无聊而诗生焉。”^①在此，戴表元明确指出了宋朝的灭亡同时也使士人们“游宦事息”，用于经国治世的“吁谟典策之具”也已没有用途，故而只好用诗来打发“无聊”的日子。当然，像元初以方凤、谢翱为核心的月泉吟社，其结社吟诗如果还带有寄托亡国之思的鲜明色彩的话，那么后来士人在长期的边缘化的过程中，便逐渐由愤激转向无奈，再由无奈转向自得其乐了。比如那位客居杭州、终生不仕的乔吉，曾有一首《自述》的散曲小令说：“华阳巾鹤氅蹁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编，翰墨云烟，香满山川。”^②他对“懒云窝”这一称谓极感兴趣，曾一口气写了六首，关键就是能够在其中“疏慵在我”，“恁我婆婆”。^③这位披鹤氅、吹铁笛、不应举、不思凡的酒圣诗禅，到底是作者现实自我的真实描绘呢，还是他所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如今已难于考证。但到了稍后的杨维桢，就完全将乔吉所描绘的变成了现实，宋濂曾如此记曰：“其风神夷冲，无一物萦怀，遇天爽气清时，蹑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怀今，直欲起豪杰与游而不可得。或戴华阳巾，披羽衣，泛画船于龙潭凤洲中，横铁笛吹之，笛声穿云而上，望之者疑其为谪仙人。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云之辞，君自倚风琶和之。座客或蹁跹起舞，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④杨维桢乃是元末士林的领袖人物，他的品格风度集中代表了士人超然物外而追求自我放任的旁观者心态。

我以为旁观者心态是元代相当一批士人的普遍心态，尽管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会有强弱的差别，但总的说来它是贯穿元代始终的，而尤以元末的吴中地区为最突出。该地区在元末曾先后活跃着两个著名的士人群体：以昆山玉山草堂顾瑛为主人的群体和以苏州的高启为领袖的吴中四杰文人群体。顾瑛玉山草堂的文人聚会时间主要集中于至正八年至十六年之间，其成员约有五十余人，几乎罗致了当时所有的东南文坛名流，其聚会内容则主要是饮酒听曲与唱和赋诗，其聚会目的则前期主要为行乐而后

①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7页。

③ 《里西瑛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0页。

④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杨君墓志铭并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

期为避难。这群文人身处社会动荡、战乱四起的时代,却依然能够纵情诗酒,实在是把旁观者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至正十二年七月有一次聚会,成员有顾瑛、熊梦祥、于立、袁华、张守中等人,熊梦祥在诗序中记曰:“七月二十六日,予自淮楚来于是,道途梗阻,虽近郡不相往来,独予以六月达吴,凡相知者莫不讶予之迂而捷也。越数日,即谒玉山主人于草堂,而匡庐山人在焉。相与议论时务,凡可惊可愕可忧可虑者不少。予乃曰:‘于斯时也,弛张系乎理不系乎时,升降在乎人而不在于位,其所谓得失安危又何足滞碍于衷耶?’玉山主人方执玉麈长啸,意气自如。时适当中秋之夕,天宇晴霁,月色满地,楼台花木,隐映高下,是犹天中之画,画中之天。乃张筵设席,女乐杂沓,纵酒尽欢。……酒既醉,玉山乃以‘攀桂仰天高’为韵分阄赋诗。诗成者兴趣横生,模写风景,殆无尽。复画为图,书所赋诗于上,亦足记一时之胜。呜呼!于是时能以诗酒为乐,傲睨物表者几人?”^①他们身处道途梗阻的战乱之时,也并非对时务不议论不了解,议论后也会发出可惊可愕可忧可虑的感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他们纵酒尽欢,模写风景。他们对于自己的诗酒之会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与愧疚,反倒拥有“于是时能以诗酒为乐,傲睨物表者几人”的自得与满足,如果不是这四周的战火对道路产生了阻隔,在他们眼中就实在发现不了与自己到底有何关系。他们所担心的,就是美景不长,乐事不再,所以要“缅思风尘际,雅会良独难。欢笑尽今夕,不醉当无还”^②。举国的“风尘”更刺激了他们寻欢作乐的欲望。后来明人董潮对此追忆说:“元末顾仲瑛处于戈戎马之会,擅园池亭榭之盛,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唱和,几忘为沧海横流时。一时名士如杨廉夫、倪云林、柯九思辈数十人,俱联袂入社。于今想见玉山风流,令人神往。”^③如果不是身处蒙元异族统治时期,如果不是存有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就不会被后人所原谅,更不会被视作令人神往的风流韵事。

如果说玉山雅会还带有更多的人生无奈与士人风流的话,高启的旁观者态度就带有更多的理性选择与利害算计。高启是吴中四杰的代表人物,他也并非没有追求功名的愿望与能力,但他身处元王朝、张士诚与朱元璋的三股势力之间,却不为任何人所用,而是隐居不出,赋诗自乐。他写了很多讨论隐逸的文字,其中以《树屋佣赞并序》最堪注意。文中写东汉末年的朋党之祸中,士大夫激于意气,“相率蹈死而不悔,有不得入者则耻焉”。而申屠子龙却能“灭迹芒砀之间,因树为屋,作同佣人”,高启将其视为高人,“慕

①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山名胜集》卷七。

② 张守中诗,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山名胜集》卷七。

其人而不得见焉”。而有一位自称是申屠子龙后人的隐士，“元季之乱，不肯仕，入林屋山，以树屋佣自号”，高启同样认为他是“群雄在罗，一鸿独飞”的高人。而那些不能全身免害者却是“众履虎尾，身同国危。捧土塞河，区区可悲”。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谁也无法挽救溃败的危局，个人的努力无异于捧微少之土塞溃决之河，非但不会有任何效果，还会毁灭自身。于是高启感叹说：“诚以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故独保其身，不欲与俱靡尔，可不谓明哲之士哉！”^①一句“不欲与俱靡”，拉开了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卸掉了士人拯救国家的责任。一根细绳拉不住将倒的大树，反而会使自己绷断毁灭，这道理也显而易见。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围绕士人的个体而展开思考，自我生命的保全成为首选，全身远害成为明智的举措。如果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相比，立时便显出两者的巨大差别。顾炎武也处于天崩地裂的时代，而且是大厦已倾的败局之中，但他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依然坚持民族的气节与抗清的决心，他要做衔微木以填东海的精卫：“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②高启与顾炎武的差别在于：顾炎武将明王朝视为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代表，将清人的入关看作是传统礼乐文化的毁灭，因而他与国家是一体的，他无法离开国家这棵大树，大树的存在是他个体存在的前提，他的生命是为大树而存活，他必须守住这份责任，直至生命结束；高启则将元王朝视为一棵借以栖身的大树，而且是并非完全满意的大树。当这棵大树倾倒之时，他可以另去寻找一棵大树来栖身，而不必与其一起倒下。他与大树的关系不是一体的，他是一个旁观者。所以他在后来回忆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既没有为元蒙的覆灭而痛心，也没有特意为明朝的建立而欢欣鼓舞，他更得意的是自己在此过程中的明智选择：“功名骤，时人笑我真迂谬。真迂谬，不能进取，几年落后。一场翻覆难收救，布衣惟我还如旧。还如旧，思量前事，是天成就。”^③看一看那些毁家灭族的达官显贵，杀头流放的伪张文人，只有他高启最为聪明，他一直当看客，哪一方都不介入，结果就像树屋佣那样，得到了一个“群雄在罗，一鸿独飞”的侥幸结局，由不得他不感叹庆幸。你不能嘲笑高启目光短浅、胸襟狭小，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

旁观者心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它不是民族矛盾的直接显现，但

① 《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16 页。

② 顾炎武：《精卫》，《故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6 页。

③ 《忆秦娥·感叹》，《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69 页。

又与民族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使元代士人丧失了政治责任感,却使他们找回了个体自我;它对元蒙朝廷缺乏应有的热情,也对明王朝难有密切的亲和力。这种种特点不仅表现了中国历史上士人精神状态的新特征,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当时文学思想的内涵与思潮走向。

与旁观者心态相关联的另一问题是所谓的士人气节。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士人气节的内涵主要包括种族意识与道德操守。有时此两者是合而出之,有时则又产生抵牾,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比如在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衡量士人的操守就主要看他有无种族意识以决定其是否具备士人的气节。在元明之际情况就要复杂一些,因为当时的君臣关系与种族关系并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士人在是否坚持操守上的矛盾与困难。从君臣关系上讲,中国古代士人经常将其喻之为夫妻关系,作为妻子一方的士人,是需要保持贞节的,哪怕他所相从的夫君荒唐腐败,也应该从一而终以尽臣妾之道;从种族意识上讲,汉族士人与元蒙朝廷的关系是一种内外关系,始终处于不被朝廷信任与重用的位置,因而就会产生上面所言的距离感并采取旁观者的心态。当元朝覆灭之时,如何处理与旧朝廷的关系就成为很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在元蒙政权中没有出仕过的士人由于不存在君臣关系,也就可以较为轻松地进入新王朝而不必承载心理的压力。而曾经在元代中过进士或任过官职的人就比较麻烦,从种族关系的角度,他们在元蒙时期受过种种的委屈与压抑,心中充满了愤懑与苦恼;从君臣关系的角度,他们又有失节失身的担忧,因而不能心安理得地面对新王朝的征召与任用,也就会做出种种的姿态与选择。这使得无论是出仕者还是隐居者都不能轻松地生活,从而在心中郁积着种种的忧虑与烦恼。高启是没有君臣关系的旁观者,他的苦恼在于尊严与个性是否能够保持;杨维桢属于囿于君臣关系而坚持隐逸的士人,他的困难在于承认新政权的合理与保持自我操守纯洁之间的矛盾;刘基是解除与旧王朝关系而加入新王朝的士人,他的困难在于建功立业、救世济民的理想追求与失去臣道、反戈旧主的隐忧折磨,这两者之间的无法协调。他们分别代表了那一时期士人的一种类型。

杨维桢是以风格奇崛的铁崖体而知名于当时与后世的,其实他一生还有几点应该得到重视:一是他有强烈的南人意识。比如说他自己及同时代人均特别看重的《正统辨》,坚持认为在修史时应该以南宋为正统而否定辽、金的地位,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理由,饶宗颐先生撮其大意曰:“论正统之说,处于天命人心之公,必以《春秋》为宗,不得以割据僭伪当之。论元之大一统,在平宋之后,故元统乃当承宋。又以道统立论,道统为治统所系,道统

不在辽金而在宋。”^①但是饶先生忽略了一点,即杨维桢除了强调正统与道统之外,还对辽金从文化上予以鄙视,如说“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②铁崖先生的确胆子够大的,因为他所瞧不起契丹的这些风俗行为,元蒙初始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后来元蒙朝廷并没有采纳杨维桢的建议,但他却为此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尤其在明初更是受到重视,大概无论是从道统还是种族的角度,这都更合乎江南士人的想法。另外一点是杨维桢的功名愿望特别强烈,总想在仕途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却一再受到打击而遭受挫折,最终不得不归隐山林,以狂放的个性与奇崛的诗风为士林所重。他有一首《感时》诗,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态:“壮志凌云气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鸣凤聊自慰,旧学屠龙良已休。台阁故人俱屏迹,闾阎小子尽封侯。愁来按剑南楼坐,寥落江山万里愁。”^③杨维桢一方面是元朝的进士与官员,另一方面又具有如此的意识与心态,所以他在明初的表现就成为众人关心的话题,并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一种说法最早见于署名詹同的《老客妇传》,说朱元璋征召其入朝,他辞谢说:“岂有八十岁老妇去木不远而且理嫁妆者耶?”并表示如果勉强,便要“蹈海死耳”。结果是“上成其志,弗受爵赏,仍给安车还山”。^④另一种说法是见于汲古阁本《铁崖先生古乐府》中危素의《铁崖乐府跋》:“会稽杨公廉夫登高科十余年,以文鸣当世。方四海有兵事,高居松江山中。一日聘至金陵,论定礼乐,乃成《铙歌·鼓吹曲》称颂武功。”^⑤该曲中有歌词曰:“大明帝,厉虎旅,拔龙飞,手把黄钺相招麾。元运绝,弭何为。”^⑥此两种传说一为替元朝尽忠的逸民,一为替新朝鼓吹的义士,恰成强烈的反差。据有人考证,《老客妇谣》中所言七十九岁年龄与铁崖实际不合,《鼓吹曲》中有《喻西蜀》章所言乃在铁崖身后,均系伪作无疑。^⑦但是,杨维桢在入明后的确曾写过歌颂新朝的诗作,例如他在《舟次秦淮河》中写道:“舟泊秦淮近晚晴,遥观瑞气在金陵。九天日月开洪武,万国河山属大明。礼义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莺花三月春如归,万姓歌谣贺天

①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② 贝琼:《铁崖先生传》,四部丛刊本《清江贝先生集》卷二。

③ 《杨维桢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页。

④ 朱存理:《珊瑚木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杨维桢诗集》,第497页。

⑥ 同上书,第452页。

⑦ 见孙小力:《杨维桢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310页。

平。”^①此诗是否为铁崖所作从文献角度不易认定,但有两点可以作为旁证:一是诗中所强调的“礼义再兴”、“衣冠重整”以及“贺天平”这些内容也一再出现于当时其他文人的作品中,故可言是当时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二是其弟子杨基在《元夕次韵铁崖先生》中曾有“白发老仙逢盛事,彩毫先咏太平诗”^②的说法,证明杨维桢当时的确写过“贺天平”的诗作。至于他到底是真心歌颂新朝还是一时的应景之作则难以判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并没有采取与新朝对抗的态度。因此我们还是宁可相信最早的两条文献记载:一是宋濂的《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及入国朝,天下大定,诏遗逸之士修纂礼乐书,颁示郡国,君被命至京师,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九山行窝。”^③二是贝琼的《杨维桢传》:“大明革命,召诸儒考礼乐。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师,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请归。”^④宋濂是杨维桢的好友,贝琼是其弟子,均与铁崖关系密切,他们的记载应该有较大的可信性。但他们的记载却是如此的平淡,朝廷召他修礼乐书,他来了;百日之后他病了,所以又回去了。当然,许多简单的历史记载之后隐藏着复杂难言的内幕,这是历史研究中司空见惯的情形。但杨维桢的情况可能不属于这些,他的故事可能真的没有后人所附会的那些传奇色彩。他既没有必要抱定必死的决心去殉旧朝,因为旧朝所给予他的几乎全是委屈与失望;他也没有必要情绪激动地去为新朝大唱赞歌,因为他已经老了,不可能在新朝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无论如何,天下太平是他希望看到的,“礼义再兴”和“衣冠重整”也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唯一的选择也许就是顺应天命而接受它。

刘基是元明之际朝代更替过程中得意士人的典型。在明清两代的历史写作中,刘基给人的印象是近于神话的足智多谋角色,并极度夸大了他的功绩以及在元明政权更替中所起的作用。后来随着现代学术思想的成熟,对刘基的研究也日益趋于深入,于是人们还知道他是在人生几近绝望时遭遇到了朱元璋,并尽心辅佐他取得了天下。文学界的研究则更关心刘基元末与明初诗风的巨大差异,这一点最早是由清人钱谦益提出来的,他认为刘基元末“作为歌诗,魁垒顿挫”,而明初得意之时却“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并认为其中大有深意。^⑤如果抛开后人种种夸张渲染的记载而细读刘基本人的作品,会发现他对元蒙朝廷的重北轻南的民族歧视,对官吏的昏庸贪残,对

① 清抄本《铁崖杨先生诗集》卷上。

② 《眉庵集》,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91页。

③ 《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

④ 四部丛刊本《清江贝先生集》卷二。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社会的动荡不安,对百姓的疾苦不幸,的确都是非常不满的,并且最终决定抛弃旧朝而另觅新主。他在《郁离子》中说:“仆愿与公子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①果然不久他便应朱元璋之召而出山了。他的出山虽有心理准备,却并非是义无反顾的。当处州被明军占领后,刘基与当地一些著名文人均藏匿于山中不肯出来,朱元璋派孙炎等使者一再催逼均无效果,后来孙炎“为书数千言,开谕天命以谕基,基无以答,逡巡就见”。钱谦益曾解释其中原因,说刘基之所以“迁延避匿”,“非独以仕元日久,不欲轻为我用,易不忍负石抹也”。^②的确如此,前不久还给石抹也孙出谋划策如何拒敌明军,转眼之间却要投入对方怀抱,这无论是情感上还是气节上都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这种失节的愧疚与隐忧并未因投入朱元璋集团而消散,而是长久地郁积于心头,并深深影响了其心态与创作。据有人考证,刘基虽然应朱元璋之召而至南京,但有五年的时间是没有接受任何官职的,^③这也许就是史书上记载朱元璋何以经常称刘基为“先生”的原因之一,即他是以客卿的身份而出现的,没有官职当然就是主客关系而非君臣上下关系,所以才会有如此之礼遇。不仅刘基如此,和他一起被召至南京的章溢也迟迟没有接受官职。还有洛阳人秦从龙、建康人陈遇,都曾任朱元璋的高级谋士,也都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官职。但秦从龙病逝于洪武元年,也许是未及授官。陈遇却可以称之为高人,朱元璋曾先后授予其翰林学士、中书左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等重要职务。但陈遇全都予以谢绝。朱元璋曾有一番评价他的话意味深长:“士之有志节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谓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④此处提到的“志节”问题毫无疑问指的是与元蒙旧朝的关系,按传统观念此乃属君臣大义。但在朱元璋登基之时,陈遇向他所陈治道却是“以复中国先王礼教为首务”^⑤。一面坚持其逸民身份,一面又不满其文化取向;一面要为新朝出谋划策,一面又要保持气节身份。这显然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尤其是始终视官位为赘物,超然于利禄功名之外,就更非常人所能具备。陈遇做到了,所以他不仅得以善终,且“崇遇之隆,虽公卿大夫无与比者”。刘基却没有做到这些,他拥有太强烈的进取意识与功名心,他不仅在五年之后接受了太史令的官职,而且还在洪武建元后接受了御史中丞的职位,并最终封诚意伯。从形式上看,刘基的确是成功了,他为子

① 《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② 《钱牧斋全集》,《太祖实录辩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0页。

③ 见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七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④⑤ 陈镐:《陈静诚先生遇传》,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一六,台湾明文书局影印本。

孙挣来了世袭的爵位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赫的地位。但这种成功是以招致他人的讥讽与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代价的。他可以不顾前元旧臣的非议,甚至可以不顾众人的侧目,但皇上朱元璋的态度他决然不能忽视,比如洪武三年元顺帝病死的消息传至朝中,众大臣相率称贺,但朱元璋却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①刘基是前元进士,又担任过政府官职,当然包括在这不许称贺的范围之内。而且朱元璋决不会只限于不让称贺的这些仪式性的行为,据考刘基的不能参与撰修《元史》,洪武年间的官场浮沉以及最后的退隐家乡,均与此因素密切相关。^②前人研究刘基入明后创作之所以陷入叹老嗟悲低调的原因,总认为是朱元璋严酷的政治与文化政策所导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气节问题的巨大心理压力所造成。在夷夏之辨上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③但在君臣之义上他却很难摆脱他人的非议,于是他只好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钱谦益早已看出了其中奥妙,故而感叹说:“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浅深者乎!”并断言“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④钱氏的话里当然也寄托着自己虽然降清而依然眷怀明朝的苦心,虽则明清之际的历史状况与元明之际颇不相同,但他看到刘基存在着巨大心理压力则是会心之言。前人研究刘基入明后的创作所以会叹老嗟卑的原因,认为那是明初严酷的政治与文化政策所造成,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巨大的心理压力所造成的精神苦闷无疑是更重要的原因,在《犁眉公集》里,有那么多低沉哀婉的作品,而且许多作品完全找不出感伤的直接原因,比如:

孤坐不寐,忧思相仍。壮年已谢,昔非莫惩。^⑤

靡草不凋,无木不稀。不睹逝波,焉知昨非。^⑥

玄武湖中草自秋,石头城下水长流。

繁华过眼成今古,更与牛羊竞一丘。^⑦

①③ 《太祖实录》卷五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② 见杨讷:《刘基事迹考述》第八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⑤ 《春夜》,《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⑥ 《秋怀》,《刘基集》,第308页。

⑦ 《钟山作》,《刘基集》,第525页。